

# 清代骈文选本与骈文学的新变

张明强

**内容提要** 骈文选本是清代骈文批评的主要形式，清乾隆以来的骈文选本一改明清之际选本应世、通俗的选编方式，取得多方面成就。这时期骈文选本有明确的选录标准和宗旨，选本批评达到自觉和成熟，建立清代六朝骈文学、唐骈文学、宋骈文学的骈文批评范式，倡导骈文正宗思想。乾隆年间成熟的台阁骈文选本是清代专题骈文选本的创新，清代台阁骈文选本以师法宋代为主，兼范唐代，最终以清人为典范，阐发润色鸿业的政治功能和文化意义。嘉道以后，以《国朝骈体正宗》等为代表的清人选清骈，主张去俗趋雅，确立以六朝文为典范的审美理念，建构清代骈文正宗谱系。清末《骈文类纂》等以选本为史，梳理骈文古今演变，勾勒典雅骈文流变史，体现出集成性和会通思想。

**关键词** 清代；骈文选本；台阁骈文；清人选清骈；骈文正宗

骈文选本是中国古代骈文批评的主要形式，具备多种批评功能。骈文选本于明代中叶兴起，明清之际开始繁荣，明清之际的骈文选本如俞安期等编《启隽类函》、李日华辑《四六全书》、李渔辑《四六初征》等都是因应酬、适用而编，即便是复古选本《四六法海》仍为“举业”而选。这些选本追求“适用为美”的原则，是南宋骈文风格的复兴，在骈文辨体、通俗骈文思想等方面具有批评价值，然缺乏自觉的骈文批评意识。清乾嘉以来，骈文选本批评趋于自觉和成熟，骈文复古思潮兴起，骈文思想由俗趋雅，骈文选本编纂具有明确的宗旨和标准，编选复古骈文选本以建立审美标准和骈文批评范式。乾隆以后专题型的台阁骈文选本出现和兴盛，凸显台阁骈文的政治书写功能和价值。清人选清骈将清代骈文纳入古代骈文正宗谱系，展现清代骈文风格和成就，清末骈文选本则总括历代骈文流变，具有会通古今的骈文史特点和集成性。

## 一 清代复古骈文选本 与骈文批评范式建立

乾嘉以来，骈文选本编选一改明末清初的征文、应酬方式，选本有明确的选录标准和宗旨，伴

随复古思潮和古雅为美的骈文思想，骈文选本批评更趋自觉和自立，形成以六朝文为正宗的六朝骈文学、以“唐音范式”为模范对象的唐骈文学、以宋四六为宗尚的宋骈文学，建构骈文理论话语，倡导骈文正宗。清人依托六朝骈文选本，确立典雅骈文标准，建构骈文正宗体系。清中叶以来，骈文正宗意识强烈，凌廷堪和阮元各自构建骈文正统说，与古文派争文章正统。乾嘉时代形成以六朝文为骈文正宗的主流骈文理论，编纂六朝文选本推动六朝骈文学深入发展。六朝骈文是清代中后期骈文复古的重心，六朝骈文学是清代骈文学的核心，骈文学的诸多重要理论都是由六朝骈文选本提出并推广。

清代六朝骈文选本以六朝文为骈文极则，推为骈文正轨，并以此作为骈文评价标准。蒋士铨推崇六朝文，《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卷首《总论》云：“四六至徐庾可谓当行。”又云：“徐孝穆逸而不遁，庾子山遁逸兼之，所以独有千古。”又卷首目录后蒋氏《识》云：“《文心雕龙》宜全选入。”同书卷八庾信《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末尾载蒋氏评云：“开府为四六大宗主，任、沈、江、鲍而上，乃其权舆；崔、李、王、杨而下，乃其支派。”<sup>〔1〕</sup>蒋氏奉庾信为骈文大宗主，以为刘勰《文心雕龙》应全部选录。受蒋氏影响，清末王先谦《骈文类纂

序目》云：“彦和书宜全读。”<sup>[2]</sup>《骈文类纂》全收《文心雕龙》。

《八家四六文钞》卷首载孙星衍序云：“今代为文有六朝风格者，惟邵叔一、袁简斋。”<sup>[3]</sup>彭兆荪辑《南北朝文钞》，卷首彭氏《原引》谓：“六朝文为偶语之左海，习骈俪而不胎息于此，庸音俗体，于古人固而存之之义何居焉。……攻《选》体者欲挽颓波而趋正轨，此编或药俗之昌阳乎？”<sup>[4]</sup>此引作于嘉庆四年（1799），所谓正轨就在六朝。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云：“有如骈体之文，以六朝为极则。”<sup>[5]</sup>蒋士铨、孙星衍、彭兆荪、曾燠等皆以六朝文为骈文正宗，确立六朝文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和典范性。

六朝骈文选本揭示六朝文独特美质和功能，为骈文指出向上一路，达到尊体和正名的目标。蒋士铨评述六朝骈文的写作手法、情感内容和词藻运用等，揭示其风格和特质，如《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卷三庾信《谢明帝赐丝布等启》文末蒋氏评云：“千百年来，风调常新，由其熟于避实就虚之法、开合断续之机也。可谓庶美必臻、微瑕必去。”<sup>[6]</sup>

基于对六朝文的研读和重新评价，李兆洛、刘开提出骈散相互为用的理论，其后称骈散合一说。这是在嘉道骈散之争中提出的有创见的文章学理论，影响直至清末民国。六朝文并非像宋四六那样全篇严格对偶，如丘迟《与陈伯之书》、江淹《恨赋》等皆以对偶为主、骈散兼行。孙德谦以傅亮《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为例，谓“此篇竟同散文，几无偶句，但究不得以骈文视之。”<sup>[7]</sup>故清代六朝骈文选本本身为骈散合一说提供文献基础、骈文标准和批评方向。《骈体文钞》卷首目录后李兆洛《序》云：“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沉随，理所必至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sup>[8]</sup>《骈体文钞》编成于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冬开始刊刻<sup>[9]</sup>，序当作于此时。李氏从《周易》里总结出相杂迭用思想，用之文章批评，形成骈散迭用的文章观，与此同时，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sup>[10]</sup>从另一角度提出骈散相互为用的理论。嘉道之际提出骈散互用的骈散合一论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对骈散之

争的回应，另一方面则是研读六朝文并发现其特质的结果。此后骈散合一说逐渐成为主流，胡念修编《四家纂文叙录汇编》刻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卷首盛开运《跋》云：“建德胡右阶太守工词章之学，上探奥窅，独有心得，每为开运言骈散一贯之道，辄断断不休。”<sup>[11]</sup>

《骈体文钞》等追源溯流，从文章发展史的角度提出骈散同源说，提高六朝文地位。以为骈文与散文都是由秦汉文而来，彼此同源，皆可称为古文。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云：“夫骈体者，齐梁人之学秦汉而变焉者也。后世与古文分而为二，固已误矣。”<sup>[12]</sup>李兆洛《代作骈体文钞序》说：“唐以前为文者必宗秦汉，唐以后，皆曰宗韩退之。退之亦宗秦汉者也。……夫文果有二宗乎？吾友李君申耆欲人知骈之本出于古也，为是选以式之，而名之曰《骈体文钞》，亦欲使人知古者之未离乎骈也。”<sup>[13]</sup>道光五年（1825）八月，许梈为《六朝文絮》作序云：“往余齿舞勺，辄喜绎徐庾诸家文，……习稍稍久，恍然于三唐奥窅未有不胎息六朝者，由此上溯汉魏，裕如尔。”<sup>[14]</sup>曾燠等从文章源流上阐明，六朝骈文与唐宋八家散文都是师法秦汉而来，彼此同源异流，为秦汉文之嫡派。

清代六朝骈文选本众多，扩大了六朝文学习范围，追求去俗趋雅的骈文审美理念。追求古雅、反对庸俗是古代文学理论的一贯主张，然雅俗的界定随着骈文标准的变化而不同。《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卷四徐陵《答周处士弘让书》末尾蒋士铨评云：“陈迦陵学子山，只见其叫豪；章思绮学仆射，适形其蹇弱。抚今怀古，益令人思齐梁之妙。”<sup>[15]</sup>陈维崧和章藻功是清初骈文名家，陈维崧骈文以博丽为宗，有初唐风格，《四库全书总目》评云：“实则才力富健，风骨浑成，在诸家之中，独不失六朝四杰之旧格。”<sup>[16]</sup>但是蒋氏以为陈文粗俗，不合其审美理念。评语蕴含骈文标准的变化，与彭兆荪《答姚春木书》对陈维崧、毛奇龄评价一样，不满于清初通俗文风，转以六朝文为标的。嘉庆四年，彭兆荪辑《南北朝文钞》，力主法古排俗，有意选录不常见骈文，达到求古雅、斥庸俗之目的。徐达源《序》云：“吾友彭子甘亭，少学为沉博绝丽之文，其持论也，宁蹇涩以违俗，勿软滑以悖古，投

迹高轨，棘棘不阿。”<sup>[17]</sup>该书专门选择《文选》、徐庾文之外的不常见文以排俗，这种选录方式对《唐骈体文钞》具有影响。

清代中后期不仅六朝骈文选本繁兴，唐代骈文选本亦受重视，唐代骈文上承六朝，在骈文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唐代骈文所呈现的“唐音范式”亦为后世模范。清代以陈均辑《唐骈体文钞》等为代表的唐骈文选本揭示“唐音范式”、建构六朝、唐骈文传承脉络、展现唐骈文流变史。

崇尚唐代骈文是清代骈文复古的重要一环，乾嘉时期颇有宗唐之风，建构六朝到唐代的骈文传承系统。乾隆前期，《华国编文选》选录唐文占一半以上，这是以唐代骈文为主的选本<sup>[18]</sup>。《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虽然以徐庾为大宗，但对唐代骈文仍多表彰。该书卷首《总论》：“王子安奢而淫，李义山纤而薄，然不从王、李两家讨消息，终嫌枯管，不解生花。”<sup>[19]</sup>《八家四六文钞》之《西溪渔隐外集》卷首吴鼐《西溪渔隐外集题词》云：“都转深于《选》学，所作擅六朝、唐初之胜。”<sup>[20]</sup>吴氏把初唐骈文作为典范，与六朝并列。乾隆末年，孙梅纂辑《四六丛话》亦推重唐文，其“汪藻”条案云：“骈俪之文以唐为极盛，宋人反诋讥之，岂通论哉？”<sup>[21]</sup>吴锡麒曾计划编选唐代骈文集，吴鼐《有正味斋续集题辞》云：“先生常欲哀唐人文为一集，谓：四杰、燕、许、宣公、玉溪生之外，作者如林，创辟门径，津梁后学不少。”<sup>[22]</sup>

嘉庆二十五年（1820），陈均编纂《唐骈体文钞》，卷首陈氏《叙》云：“论者遂欲排齐梁于既衰，等陈隋于自桀。……其能嗣绪六朝，式靡五季，雕盘十采，奉徐庾于勿祧；华轮九涂，接温邢而方驾者，李唐一代，大有人焉。”又谭宗浚《跋》云：“窃谓骈俪之文自以沈任徐庾为极则，而善学沈任徐庾者莫若唐人，虽蹊径稍殊而波澜莫二。”<sup>[23]</sup>陈氏以为唐代骈文上承六朝，是六朝骈文嫡派。道光五年（1825），许梈为《六朝文絜》作序云：“习稍稍久，恍然于三唐奥窅未有不胎息六朝者。”<sup>[24]</sup>都揭示了唐代骈文与六朝文的关系，实则展示出由六朝文到唐骈文的传承脉络。

《华国编文选》《骈体探珠》等揭示唐代骈文风格，建立唐音范式，呈现唐骈之美。《华国编文选》

选录大量唐人骈文并加评论，如柳宗元《唐故特进南府君睢阳庙碑》有评语云：“健骨峻峻，沉雄顿挫。”<sup>[25]</sup>《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卷二李商隐《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文末蒋士铨评云：“全是唐音，亦复佳善。近人作四六，仅向此等讨生活，固已居然名手矣。可叹！”<sup>[26]</sup>《骈体探珠》第2册骆宾王《兵部奏姚州破逆贼诺没弄杨虔柳露布》题下评曰：“洒洒千余言，无一懈句懈字，天下岂易有此才。”<sup>[27]</sup>这些选本评点阐释其艺术风貌和写作特点，推进对唐代骈文的认识和评价。

《唐骈体文钞》呈现唐代骈文流变，其选录原则体现远俗趋雅的思想，陈均《叙》云：“则舍旧册而采新，亦以恒见而捐爱。要使孤芳留赏，遗世见妍。……遂矫宝臣之偏汰，用补雍熙所未登。”<sup>[28]</sup>是书主要收录不常见的唐文，常见之文因人人习之而成为庸俗，故开发新的文章以药俗。《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评云：“斯论也，不仅唐世俪文之正变，与夫源流盛衰，可以窥见，而斯集选择之大概亦可于此论征之矣。”<sup>[29]</sup>

乾隆年间，即出现宋骈文选本，这些选本对宋代骈文作法、骈文功能、骈文典故等加以探讨，推动台阁骈文和通俗骈文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形成清代宋骈文学。宋代骈文承唐代而自成一格，具有对偶工稳、隶事贴切、善用长对等特征。《华国编文选》《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等对宋代骈文的艺术技巧、作法多有揭示。《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卷一汪藻《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文末蒋氏评云：“此篇与隆佑手书俱存，以备宋调。”<sup>[30]</sup>蒋氏视宋骈文为宋调，然宋调自成一格。彭元瑞《宋四六选序》云：“懿夫俪体，尚矣六朝，风肇变于樊南，派大岐于赵宋。……是知诗裁元白，亦列正声；词出苏辛，更参别调。”<sup>[31]</sup>表达了对时人将宋代骈文当作别派的不满，认为宋代骈文也值得学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云：“考宋世俪体，实异于唐，尤异于六朝。揆其风尚，自成一格。”<sup>[32]</sup>宋代骈文对清代颇有影响，清代骈文家具有宋骈文风格者如章藻功、张之洞等。

宋代骈文是清代台阁骈文和通俗骈文宗法的主要对象。清代台阁骈文尤盛行宋代骈文之风（宋调），乾隆四十一年刊行的《宋四六选》选录重点

在诏、制、表、启四类，是以台阁骈文为主的选本，这是宋代骈文影响清代台阁制作的例证。彭元瑞《宋四六选序》云：“又况体各攸宜，情有独到。制诏以宣上德，表启以达内心。”<sup>[33]</sup>阐明台阁骈文“宣上德”“达下情”的功能。《宋四六选》流传甚广，曹振鏞云：“《宋四六选》一书，海内奉为圭臬者廿有余年。”<sup>[34]</sup>乾隆末年刊行的《丽体金膏》卷六、卷七、卷八选录自汉至宋的台阁骈文共89首，其中宋代就有61首<sup>[35]</sup>。从选录比重可看出宋代骈文为台阁骈文的代表，具有典型性。清代台阁文人多效法之，亦有评点，如翁同书评点《宋四六选》。

## 二 清代台阁骈文选本的典范变迁与政治文化功能

台阁骈文选本是清代专题骈文选本的创新，乾隆年间，国势日隆，文治武功取得瞩目成就，伴随而起的是台阁骈文成熟和繁盛。台阁骈文兴盛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清代台阁骈文（应世骈文）在国家政治中充当润色鸿业、鼓吹休明的作用，是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的作品。从《华国编文选》《宋四六选》到《丽体金膏》《骈体南针》等都是弘扬台阁骈文的选本，构成台阁骈文选本系列。李兆洛《骈体文钞》很大程度上也是宣扬台阁骈文的选本。所选篇目则由全录前代骈文到前代和当代兼录，后来则只登当代；清代台阁骈文经由师法前人到模范清人的转变，表明清代台阁骈文的成熟，成为新的典范；从写作对象上看，由兼录君对臣和臣对君之作，到只选臣对君之文的转变。这种选文变化，既表明乾隆以来台阁骈文的成就和典范的变迁，又便于学者模拟。台阁骈文选本重在揭示台阁骈文的特征、作用和政治书写意义。

《华国编文选》《宋四六选》《骈体探珠》等前代台阁骈文选为清代台阁骈文创作树立标准和典范，乾隆前期侧重学唐人，乾隆中后期师范宋人为主。

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雍正帝谕内阁云：“朕惟博学鸿词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润色鸿业，膺著作之任，备顾问之选。圣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特诏内外大臣荐举博学

鸿词，召试授职。”<sup>[36]</sup>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博学鸿儒科，上承宋代词科，考试内容注重骈偶。雍正帝计划的博学鸿儒考试未能如期进行，但从皇帝和朝廷层面重视大臣的“文藻瑰丽”“文词卓越”<sup>[37]</sup>，朝廷制作逐渐向骈偶化转变，到乾隆年间最终形成风气。孙馥孙（1668—？）看到雍正帝的上谕后编辑《华国编赋选》四卷，包括《唐赋选》二卷，卷首孙氏自序云：“近奉明诏，征鸿博之儒，备顾问之选，猗欤盛哉！士生斯世，遭逢何庆幸欤！……因欲仿《昭明文选》之例，自赋以下，取骈俪之体，厘为若干卷，探讨而评论之。以为明光起草、大廷应制者折衷取法。”<sup>[38]</sup>孙氏此编是为了“大廷应制”，表明赋等骈体的政治功能。

《华国编文选》为前代台阁骈文选本，乃清代台阁骈文选本之嚆矢，建立以唐代骈文为主的台阁骈文审美规范。此书八卷，由孙馥孙、孙乔年父子编定，刻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选从汉到唐宋之文，选录较多的文类有表、祭文、启、制等。与明末清初《四六法海》《听嚶堂四六新书》不同，是书主要关注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应制之文”，乃专题文选，这是一种新的选文标准和倾向。《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评云：“惜乎选本以偶为宗，以奇为辅，分类又近于应制，殆未脱当时之积习也。”<sup>[39]</sup>实则这种分类正是新的台阁骈文选本的特征。卷首孙乔年《凡例》云：“此《华国编文选》之独登偶体与韵语者，为应制而作也。应制未尝无散行，而骈丽为多。盖台阁文章非驴背奚囊、郊寒岛瘦者可比。且应制之体，诗赋为先，诗赋无不用韵、无不用骈。”<sup>[40]</sup>揭示出台阁骈文的功能和特征。

《宋四六选》则以宋代台阁骈文为宗，推阐乾隆中后期台阁骈文新风。由彭元瑞和曹振鏞编，选文以诏、制、表、启（通启除外）等台阁文为主，占十九卷。这是继《华国编文选》八卷后一部以前代台阁骈文为主的断代选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评云：“后世狃于积习，误认宋世多工古文，而多不考其文体之嬗变，与诸家之文辞。盖骈俪之工，固亦不减隋唐焉。”<sup>[41]</sup>由《华国编文选》到《宋四六选》，选文的范围和侧重都有变化，从重视台阁骈文选录，到几乎专选台阁骈文，学古

的对象由侧重唐代到独尊宋代，反映了乾隆中叶以来新的台阁文风。彭氏身处翰林院、内阁，常常需要撰拟台阁骈文，宋代台阁骈文易于模仿，且适合弘扬朝廷气象，成为学习的对象。清末翁同书专门批点《宋四六选》<sup>[42]</sup>，可见此选在台阁文人中的典范性和持久影响。彭元瑞为台阁骈文代表作家，《丽体金膏》《骈体南针》皆大量选录其作品。

清代乾隆中期以来，台阁骈体崇尚宋四六，《宋四六选》外，刻于嘉庆三年（1798）的《八家四六文钞》收孙星衍《问字堂外集》，卷首吴鼐《问字堂外集题词》谓：“近日能手专师宋人，属对工致。”<sup>[43]</sup>亦可反映乾隆中后期台阁骈文的崇宋风尚。明末清初通俗骈文创作主流就是模仿宋代骈文，是宋代通俗骈文风气的复归，到乾隆年间，朝廷台阁文章又是对宋代台阁骈文的复兴。可以说宋代台阁骈文和日常应酬型通俗骈文在清代都得到了很好的振兴，并融入新的时代风会而各具面貌。

乾嘉之际的《骈体探珠》兼采六朝、唐代骈文，是乾嘉时期骈文坛崇尚六朝之风渗透到台阁骈文的表现，与《骈体文钞》上编都预示着台阁骈文的六朝祈向。此书录汉末孔融至唐代骈文，有圈点、评语，分七、玺书、册文、勅、制、表、启、状等37种类，总255首。所载文类与《华国编文选》相近，庾信、李商隐等人的作品登录较多，实则仍是以台阁骈文为主的选本。卷首翁同书《跋》云：“此《骈体探珠》三册，吾乡张尧友先生手书。……予姑丈陆子仪先生廷弼为张氏宅相，旧藏是编，以赠先文端，忆寓直澄怀园之乐泉西舫，常置案头也。”<sup>[47]</sup>跋作于同治二年（1863）腊月。张燮（1756—1811），字尧友，为常熟著名藏书家<sup>[44]</sup>，则此抄本为张燮所辑，编纂时间当在乾嘉之际。翁心存（1791—1862）将此书常置案头，为写作朝廷应制之文的重要参考书。

李兆洛（1769—1841）“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后蒙恩入庶常，台阁之制例用骈体”<sup>[45]</sup>，所辑《骈体文钞》编定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上编为“奏进之篇”，李氏云：“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垂诸典章、播诸金石者也。夫拜颺殿陛，敷颂功德，……马、班已降，知者盖希。”<sup>[46]</sup>汇辑铭刻、颂、杂颺颂、诏书、策命、告祭、教令、策对、奏

事等18类。《骈体文钞》上编属于台阁骈文选，这部清代著名骈文选本，客观上揄扬台阁骈文，可见台阁骈文对文坛大且久的影响。

乾隆末年，随着清代台阁骈文创作的繁荣，台阁骈文选本选录当代骈文，《丽体金膏》是首部以清代台阁骈文为主的选本，标志清代台阁骈文风格的形成和成熟。《骈体南针》专选清代台阁骈文，以乾隆时期作品为主，由此建立以清人台阁骈文为新典范的时代。与乾隆盛世相辅相成，台阁骈文展现大一统王朝的文治武功，承担润色鸿业的盛世书写和颂扬文化。

乾隆前中期《华国编文选》《宋四六选》皆选前代骈文，而《丽体金膏》则以当代为主，兼顾前代，这种转变说明经过乾隆朝的文教发展，已经形成与清代国家礼乐政治相对应的台阁骈文风格，树立清代台阁骈文标准。马俊良辑《丽体金膏》八卷，刻于乾隆末年。该书专收臣对君的台阁骈文，《华国编文选》《宋四六选》等书所录诏、制等君对臣的作品皆不预。卷首马俊良《识》谓：“《行厨》《留青》等集陈陈相因，奏疏略及条陈，殊非体要。夫喜起赓歌，权舆虞代，下及汉世，雍容揄扬，宣上德而尽忠孝，不可阙也。”<sup>[47]</sup>《叩钵斋纂行厨集》《凭山阁留青集选》等刊于康熙年间，所选以日常应酬、普通仕宦为主，此类总集在康熙后未见再有刻印，代之而起的是台阁骈文选，这种变化反映了台阁骈文日益受到重视，骈词俚句的政治书写与大一统的清国盛世相匹配。《丽体金膏》选录于敏中、彭元瑞、纪昀、毕沅、朱珪、阮元等重臣之作，如卷四毕沅《金川全境荡平贺摺》、纪昀《三幸天津谢恩》、卷五彭元瑞《紫禁城骑马谢摺》等皆宣扬皇威、颂赞盛世，展现政治太平、礼乐文化繁盛之景。

《骈体南针》为清人选清台阁骈文选本，树立台阁骈文新范式。编者汪传懿（？—1852）擅长骈文，以游幕为生<sup>[48]</sup>。此书始编于道光前期，继承《华国编文选》《宋四六选》，特别是《丽体金膏》的编选传统，而专选清代乾隆间台阁骈文，揭示台阁骈文“主颂扬”的特征，及宣上德而达下情之功能。卷首杜翰《骈体南针序》云：“《新唐书》谓：下之词通于上者六，……国朝至乾隆以来，兼

范唐宋，乃益钜丽闳畅矣。若于文敏、彭文勤、纪文达、曹文正，其尤伟者也。……予观是编凡有数美，见明良之合焉、忠爱之忱焉、敷奏之体焉，合于班氏所云‘宣上德’‘通下情’者。”又卷首孙家鼐《骈体南针重镌序》云：“汪君诚创举哉！夷考其文，体主颂扬，涉于议者不载。其所摭拾大抵在乾隆年间。”<sup>[49]</sup>

《骈体南针》分庆贺、陈谢、陈请等，所选摺子、表、疏皆当时流行的台阁骈文文类，卷首汪传懿《例言》云：“国朝四六章奏远胜前代，而其纂组工丽，则自乾隆中年以后，益进而日臻于盛。“……编内摺子居多，间有表疏，悉照原钞标题，以别体裁。”<sup>[50]</sup>该书卷一庆贺类，选录《请祝万寿摺》二首、《恭请编辑万寿八句盛典摺》《两金川荡平贺摺》三首等，为揄扬君主、歌颂功德之作，属“宣上德”的政治书写。

### 三 清人选清骈与清代骈文 正宗谱系建构

清人对本朝的骈文通过编选、评点、注释等方式展示创作成就，推出典范作品，树立评价标准，建立骈文文统，弘扬骈文主张，这是清代清骈文学的主要内容。不论清初还是清末，在骈文批评上都崇尚典雅骈文，刊行于嘉庆年间的吴鼐辑《八家四六文钞》和曾燠辑《国朝骈体正宗》，首次明确以清代典雅骈文为宗旨，以六朝文风格为标准，选录清代骈文，建立骈文正宗谱系。明清之际虽然也有当代骈文选本，然主于应世、应酬，非按一定审美标准选录。故这两部选本的出现标志着清代典雅骈文批评的成熟。清末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骈文选本主要有吴、曾二书的续编本、评本，继承清代中期的选录标准和体例，拓展和完善骈文正宗系统，构成较为完善的清代骈文正宗体系。

（一）《八家四六文钞》《国朝骈体正宗》与清代骈文正宗谱系的建立

《八家四六文钞》之《问字堂外集》卷首吴鼐《问字堂外集题词》谓：“读者激发性情，与雅颂同。至于揽物寄兴，似赠如答，风云月露，华而不缛。然后其体尊，其艺传。”<sup>[51]</sup>强调骈文尊体问

题。在推尊骈体基础上，《八家四六文钞》和《国朝骈体正宗》以典雅骈文为标准，以师古砭俗为要务，肯定和发扬清代典雅骈文的成就。典雅骈文注重骈文的用词古雅、内容真挚，以传世为鹄的。《八家四六文钞》之《小仓山房外集》卷首吴鼐《小仓山房外集题辞》云：“凡先生文之稍涉俗调与近于伪体者，皆不录。”又孙星衍《问字堂外集》卷首吴鼐《问字堂外集题词》云：“又八年，遇于京师，渊如已壹其志治经，取少作尽弃之，而独好余所为四六文，以为泽于古而无俗调。”<sup>[52]</sup>表达了去除俗调、独存典雅的骈文思想和选录原则。佐助曾燠辑《国朝骈体正宗》的彭兆荪极力主张骈文法古去俗，其《答姚春木书》云：“近佐辑《骈体正宗》一书，……文匪一格，以远俗为工；体无定程，以法古为尚。”<sup>[53]</sup>

吴、曾主张法古去俗，将骈文复古对象指向六朝，以六朝典雅骈文为旨归，将清代骈文纳入中国骈文史，自觉建立清代骈文标准、正统和统系。嘉庆三年（1798），吴鼐辑刊《八家四六文钞》，这是清代中期首部以六朝初唐文风为标准而编的清人选清骈，该书孔广森《仪郑堂遗稿》卷首吴鼐《仪郑堂遗稿题词》云：“其犹子禀轩太史四六文乃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又曾燠《西溪渔隐外集》卷首吴鼐《西溪渔隐外集题词》云：“都转深于《选》学，所作擅六朝唐初之胜。”<sup>[54]</sup>《国朝骈体正宗》同样推阐六朝文风，曾燠《序》云：“有如骈体之文，以六朝为极则。乃一变于唐，再坏于宋，元明二代，则等之自郅，吾无讥焉。”<sup>[55]</sup>

《八家四六文钞》和《国朝骈体正宗》是两部标志性的骈文选本，由此开始，清人选清骈进入崇尚典雅的路径，吴鼐和曾燠都以清代骈文上接汉魏六朝、初唐，以六朝文标准遴选清文，吴鼐选录袁枚、吴锡麒、孔广森、邵齐焘、孙星衍、曾燠、刘星炜、洪亮吉八家骈文，称“八家四六”，隐与唐宋八大家对垒<sup>[56]</sup>，建构了乾隆年间清代骈文正统作家群，以之上接六朝。《国朝骈体正宗》具有更直接的正宗意识，书就以“正宗”命名。这部书扩大选录范围，构建了从清初到清中期的骈文正宗谱系，其选录标准和方法为《皇朝骈文类苑》《国朝十家四六文钞》继承。光绪十五年（1889），王先

谦编刊《国朝十家四六文钞》亦沿用此标准，卷首王氏《序》云：“都为一集，共得十人。网罗众家，窃附全椒之例；推求正宗，或肖南城之心。”<sup>[57]</sup>全椒，指吴薰；南城，即曾燠。

（二）清末骈文选本续编与骈文正宗体系的完善

清末骈文选本如《后八家四六文钞》八卷、王先谦辑《国朝十家四六文钞》十一卷、张鸣珂辑《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八卷、孙雄辑《同光骈文正轨》不分卷等，延续吴薰辑《八家四六文钞》和曾燠辑《国朝骈体正宗》的体例与选录标准，完善清代骈文正宗系统，继续弘扬典雅骈文文风。

光宣时期的《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和《同光骈文正轨》是以作品为中心的骈文选本，继承清代中叶以六朝文为标准的骈文正宗观，肯定嘉道以来骈文成就，将嘉道以来的骈文和骈文家纳入正宗谱系，完善骈文文统。曾燠辑《国朝骈体正宗》选录清初陈维崧至清中叶汪全德等42家，共172首作品，勾勒清代前中期骈文作品和骈文家谱系。张鸣珂编选《国朝骈体正宗续编》扩展骈文正宗谱系到同光间，缪德棻云：“南城曾宾谷先生尝辑《骈体正宗》一书，颀波独振，峻轨遐企。芟薙浮艳，屏绝淫蛙。……然而鉴裁精审，尚止乾嘉以前；搜选丛残，未逮道咸而后。褒录仅四十二家，旷隔已八十余载。……遂取时贤之作，以续曾氏之书。”<sup>[58]</sup>《续编》选录曾燠至易顺鼎等嘉道以来60位骈文家的作品，共149首。光绪十八年（1892），孙雄有意继《国朝骈体正宗》纂辑续编，其《同光骈文正轨序》云：“余于壬辰、癸巳间，客京师，即有继续南城曾氏选辑《国朝骈体正宗》之举，录稿凡六十余家，为文四百余篇。自嘉道以迄同光，作者略具。二十年来，橐笔鲜暇，兹事几束高阁。……因取近代名作，以钢笔版写印数十篇，名曰《同光骈文正轨》。”<sup>[59]</sup>《同光骈文正轨》录曾国藩至朱铭盘共26家，梳理同光间骈文正宗谱系。从《国朝骈体正宗》到《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同光骈文正轨》，扩展并完善了骈文正宗谱系，展示清代骈文的成就。

光绪间刊行的《后八家四六文钞》《国朝十家四六文钞》，是继《八家四六文钞》后以骈文名家

为中心的骈文选本，推出“后八家”“十家”称号，形成清代骈文名家系列。学者在骈文名家的选择上虽有出入，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这些骈文家的地位和骈文风格。《后八家四六文钞》选录张惠言、乐钧、王昙、王衍梅、刘开、董祐诚、李兆洛、金应麟等八人<sup>[60]</sup>，王先谦辑《国朝十家四六文钞》则选录刘开、董基诚、董祐诚、方履篔、梅曾亮、傅桐、周寿昌、王闳运、赵铭、李慈铭等十位骈文名家之作<sup>[61]</sup>。这种选录方式有利于突出作家个人，把一个时期的骈文成就以代表作家的形式呈现出来，是古代骈文选本的重要选录方法。事实证明，这种选录方式对推扬骈文名家作用十分明显，清末以来常为人所称道的骈文家大多来自这几种选本，这是骈文名家生成的重要方法。

#### 四 清末骈文选本的历史意识与会通思想

清末骈文选本开始对清代骈文和前代骈文进行梳理和总结，出现了集成性的断代选本《皇朝骈文类苑》，以及通代骈文选本《骈体文林初目》《骈文类纂》，前者搜集清代骈文作品，后者选录历代骈文，从选文上探求骈文的源流通变。

《骈文类纂》《骈体文林初目》审视骈文古今演变，辨析各种文类源流终始，展现骈文发展史，体现了骈文会通思想。光绪年间，朱启勋纂《骈体文林初目》，选录汉代至清代之文，通过选录各代作品考察骈文流变。谭献《文林叙》云：“吾友宜兴朱君所以缉辑《文林》，采撷辞圃也。……上下千载而求其合，网罗群籍以观其通。……文章至此，又岂有奇偶之迹也哉？”<sup>[62]</sup>朱氏选辑千余年来骈文的目的就是“观其通”，又谭氏《与朱又笏书》云：“足下历代骈文之选，如吾意中之言，去取之旨，伪体悉裁；求助之诚，退舍不敢。刘孟涂可与道古，四渎导其洪源；曾宾谷之谓知今，五金纳于巨冶。前事可师，后来居上已。”<sup>[63]</sup>揭示了《骈体文林》以六朝文风为正体的选录标准。

《骈体文林初目》只存抄本，影响有限。王先谦辑《骈文类纂》由思贤书局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卷首王先谦《骈文类纂序目》云：“骈文

之选莫善于王闾修《法海》、李申耆《文钞》，倾沥液于群言，合炉冶于千载。顾王则题目太繁，李则限断未谨。所居之代，抑又阙如，不足综古今之蕃变、究人文之终始。美犹有憾，斯之谓与？屏居多暇，旧籍盈几，复甄录尤异，剖析条流。推宾谷《正宗》之旨，更溯其原；取姬传《类纂》之名，稍广其例。”<sup>[64]</sup>《骈文类纂》与《骈体文林》一样要会通古今，揭示骈文的流源正变。基于此，《骈文类纂》的选目与众不同，比如选录陈子龙骈文22首<sup>[65]</sup>，其云：“华亭崛起晚末，抗志追摹，词藻既富，气体特高，《明史》称工，非溢美矣。”<sup>[66]</sup>这是首次揭示陈子龙在中国骈文史上的地位，陈氏不仅在清代词史上有先导作用，其骈文同样是清代典雅骈文复兴的先驱。

《皇朝骈文类苑》集有清一代骈文，以文存人，全书兼容并蓄，雅俗共登，呈现出清代骈文多种风格和巨大成就，侧面展示清代骈文发展形态。卷首郭传璞《皇朝骈文类苑序》云：“圣清诸儒历算、輿地、律吕、声均、训诂之学远迈前代，而骈文尤盛。近彭氏兆荪助曾氏燠选《正宗》四十有二家，尚已。然人系以文，未析为类。我师镇海姚复庄先生选有《皇朝骈文类苑》一书，凡百二十有五家，为文五百三十有二首，为类一十有五。盖衷李氏体裁，搜罗闳富。”又姚燮《皇朝骈文类苑叙录》云：“燮谬不自揣，博遴而类隶之，始国初，及近代，得百数十家，复承李氏之例，略变通之。”<sup>[67]</sup>

《皇朝骈文类苑》与《国朝骈体正宗》比较，以清初而言，《国朝骈体正宗》选录毛奇龄、陈维崧、毛先舒、陆圻、吴兆骞、吴农祥等六人，《皇朝骈文类苑》则选取十一人，未选吴农祥《画图梧园记》一文，增加陆繁弢《吴山伍公庙碑文》、高士奇《登岱颂》、朱彝尊《春蒐赋》《醉司命辞》、尤侗《平滇颂序》、汪琬《丑女赋》《反招隐辞》、姜宸英《数贼文》。《皇朝骈文类苑》不仅选入作家数量远超《国朝骈体正宗》，且入选文类有所扩大，《国朝骈体正宗》不选赋类，而《皇朝骈文类苑》载录朱彝尊《春蒐赋》、汪琬《丑女赋》。选文风格兼容并蓄，如选录汪琬《反招隐辞》等骚体之文。审美上雅俗兼备，不仅选入具有六朝风格的典雅之作，亦选入朱彝尊《醉司命辞》、汪琬《丑

女赋》、姜宸英《数贼文》等诙谐、通俗作品。从作家而论，不仅选录骈文名家如陈维崧、陆圻等，亦选入汪琬、姜宸英等以古文著称者。

清末注重流源的骈文选本仍推阐六朝文风，建立以六朝文为审美理想的典雅骈文史。姚燮选《皇朝骈文类苑》主要目的是以文存人，雅俗各有所录，但他在《皇朝骈文类苑叙录》中仍继承彭兆荪的选文标准，以排俗尚雅相期许：“而彭兆荪氏所云‘矫俳俗、式浮靡’‘揽翮剔毛，具存微愠’者，非欲恃能，尚不睽其谊焉。”<sup>[68]</sup>朱启勋纂《骈体文林初目》之《叙录》云：“国朝俪体，祧唐秩宋。……乾隆以后，雅材辈起。荀慈安雅，容甫柔厚，骧轩高朗，北江幽秀。四雄并峙，六代同风。俪体正轨，实在于此。”<sup>[69]</sup>邵齐焘、汪中、孔广森、洪亮吉等四雄文具有六朝风，推为“俪体正轨”，以六朝文风为标准，建构骈文正宗史。

清代骈文选本有明确的选录标准和审美理想，推动骈文学的自觉和成熟，不仅提供骈文批评基础文献，也促进和生成骈文思想、骈文风格和骈文批评范式，骈文学的重要论题和观念演变多借助选本得以实现。清初骈文选本揭示清初骈文应世、适用审美追求和通俗特质。乾隆朝台阁骈文选本树立清代台阁骈文批评标准，阐发润色鸿业的政治文化功能。嘉道时期骈文选本主要任务是去俗趋雅，改变清初骈文选本适用、通俗之弊，确立以六朝文为规范的典雅骈文审美理念，构建骈文正宗系统。清末则以会通思想梳理历代骈文，继续完善骈文正宗谱系，以选本为史，呈现出中国骈文的古今演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骈文学通史”（项目编号21XZW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6][15][19][26][30]《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蒋士铨评选，清同治十年（1871）藏园刻《蒋氏四种》朱墨套印本。

[2][64][66]王先谦：《骈文类纂》卷首，第3页，第3页，第2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20][43][51][52][54]吴鼐：《八家四六文钞》，清嘉庆三年（1798）较经堂序刻本。

[4][17]彭兆荪：《南北朝文钞》，《丛书集成初编》第1829册，第1页，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 [5][12] 曾燠:《赏雨茅屋外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6册,第3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 [7] 孙德谦:《六朝丽指》,《历代文话》第九册,第844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8][13][45][46] 李兆洛:《骈体文钞》,《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第354页,第691页,第354页,第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9] 蒋彤:《武进李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31册,第70—8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
- [10] 刘开:《刘开集》,《桐城派名家文集》第4卷,徐成志点校,第46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 [11] 胡念修:《四家纂文叙录汇编》,《历代文话》第七册,第621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14][24] 许槌:《六朝文絮》卷首,清道光五年(1825)许氏享金宝石斋刻朱墨套印本。
- [1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524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 [18][25][40]《华国编文选》,孙濩孙原辑,孙乔年增辑,清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自刻本。
- [21] 孙梅:《四六丛话》,《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第62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 [22] 吴鼐:《吴学士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87册,第4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23][28] 陈均:《唐骈体文钞》,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陈璞(谭宗浚校)刻本。
- [27][44]《骈体探珠》,清张燮抄本。
- [29][32][39][41][48]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28册,第765页,第762页,第187页,第762页,第796页,齐鲁书社1996年版。
- [31][33] 彭元瑞、曹振鏞:《宋四六选》卷首,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刻本。
- [34] 彭元瑞:《宋四六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15册,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35][47] 马俊良:《丽体金膏》,清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石门马氏大西山房刻《龙威秘书》本。
- [36]《清实录》第八册《世宗实录(二)》,第68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 [37] 李集:《鹤征录》,李富孙、李遇孙续,《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二辑第23册,第563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 [38] 孙濩孙:《华国编赋选》卷首,清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
- [42]《宋四六选》(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之翁同书评本,彭元瑞、曹振鏞编,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号:06092。
- [49][50] 汪传懿:《骈体南针》,清同治五年丙寅(1866)汪家政重刻本。
- [53] 彭兆荪:《小谟觞馆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第6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55] 曾燠:《国朝骈体正宗》,《续修四库全书》第1668册,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56] 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第164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 [57][61] 王先谦:《国朝十家四六文钞》,清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长沙王氏刻本。
- [58] 张鸣珂:《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668册,第209—2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59] 孙雄:《同光骈文正轨》卷首,清宣统三年(1911)油印本。
- [60]《后八家四六文钞》,清光绪七年(1881)张寿荣刻本。
- [62][63] 谭献:《谭献集》,罗仲鼎、俞浣萍点校,第197—198页,第231—23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 [65] 王先谦:《骈文类纂》卷首《撰人姓氏》,第3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按,《撰人姓氏》云“陈子龙卧子文二十一首”,但目录和正文实收22首。
- [67] 姚燮:《皇朝骈文类苑》,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镇海张寿荣校刊本。
- [68] 姚燮:《复庄骈俪文榷》,《续修四库全书》第1533册,第3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69] 朱启勋:《骈体文林初目》,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六年(1890)抄本。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超